

文史哲研究丛刊

遗业与轨则

百年中国学术论衡

戴登云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史哲研究丛刊

遗业与轨则

百年中国学术论衡

戴登云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遗业与轨则：百年中国学术论衡 / 戴登云著.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4
(文史哲研究丛刊)
ISBN 978-7-5325-7548-0

I. ①遗… II. ①戴…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中
国—现代 IV. ①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8102 号

文史哲研究丛刊

遗业与轨则：百年中国学术论衡

戴登云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惠顿实业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6.625 插页 2 字数 166,000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300

ISBN 978-7-5325-7548-0

K · 1998 定价：34.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目 录

引 言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创新如何可能	001
一、学术史研究的双重使命	001
二、思想史研究的内在困难	005
三、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复杂纠缠	009
四、学术思想的新视野与方法路径	014
 第一章 究竟何谓“学术”	
——基于当代中国学术史的反思	018
一、当代中国学术的多重面向与多歧走向	018
二、“学术”观念的论争及其自明性缺失	022
三、从学术史的内部敞现“学术”的本来属性	030
四、“学术”观念的重构与学术史反思的问题域	034
 第二章 现代中国学术的语境与“学无中西”论	039
一、“学无中西”论的历史吊诡	039
二、“学无中西”论的论争语境	040
三、“学无中西”论的本源性理据	044
四、“学无中西”论的逻辑缺失	046

第三章 现代中国学术典范的内在缺失	051
一、“学有三分”论与现代学术分科谱系	051
二、现代学科谱系的建立与现代学术的典范特征	057
三、现代学术典范的内在缺失	061
第四章 现代中国诗学建构的理论基点	066
一、现代中国诗学建构的问题意识	066
二、“返本穷源”与现代中国诗学建构的方法路径	069
三、现代中国诗学的理论洞见与失察	074
四、现代中国诗学对古典中国诗歌的重释	082
第五章 现代中国学术的价值诉求及其内在困境	086
一、现代学术的价值本性	086
二、现代学术价值的生命践履	088
三、学术变迁的总体历史视野	092
四、“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的生成语境	094
五、现代学术价值之思的历史局限性	101
第六章 现代中国的学术精神与学科规训	104
一、现代学术精神的个体生命维度	104
二、现代学术精神的文化创生维度	109
三、现代学术精神的历史深度	113
四、现代学术精神的文明史限度	115

附 录

“发现东方/重释中国”作为一个当代难题	123
一、西方为什么要妖魔化中国?	125
二、中国之所以可以被妖魔化的前提	131
三、作为跨文化翻译的不可能性	136
四、在他者的参照中理解自我的有限性	143
对话：关于中国文史传统的重释	151
一、关于中国文史研究的学术自省	151
二、中国文史传统研究的阐释学自觉	160
三、中国文史传统重释的经验、方法与路径	168
论文论研究的范式转型	176
一、文论研究的当下语境与思想使命	177
二、文论研究的路径依赖与思想制约	184
三、文论研究的新方法路径和思想视野	191
四、文学观念的重构与文论研究的范式转型	197
后 记	205

引言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 创新如何可能

一、学术史研究的双重使命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学术规范化”讨论,到今天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创新性”吁求,当代中国学界已经越来越普遍地感到:只有从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内部,发现既具有现代中国学术思想演进的内在必然性、又与全球学术思想的转型变迁趋势“同步共振”甚至“预流”的——亦即,既植根于现代中国历史语境内部、又具有全球普遍有效性的“问题谱系”和“方法路径”,然后通过对这些“问题谱系”的反思和“方法路径”的推进,提炼出新的命题与理论假说,才能真正有效地解释和应对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结构转型与剧烈变迁,进而实现对历史的重新定位。^① 基于这种自觉,对学术史的研究和反思,自然也就被摆到了某种优先的位置,甚至

^① 相关讨论请参邓正来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回顾与前瞻》(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一书所写的“代序”:《中国社会科学의 当下使命》,以及吴晓明、郅正、瞿林东、郑杭生、曾令良以“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为总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11 年第 2 期的一组笔谈。

持续地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和前沿之一。^①

然而,正因为此,学术史反思热的持续兴盛,似乎正好反过来说明了当代中国学术界还远未实现这一目的。如是,我们便可以说,当代中国的学术史反思热,(至少到目前为止)不但没有通过学术史的重构与重估普遍地激发出当代中国学人的反思潜能,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实现某种期待已久的学术突破和理论跨越;相反,倒又一次成为当代中国学界的自我反思能力与理论建构能力异常匮乏的表征之一。^②

当代中国的人文学术迫切地需要新的思想启蒙和理论奠基。当代中国学界当如何努力,才能实现此一目的?如果任何现成的理论借鉴和凭空的理论建构皆已证明无济于事,那么显然,重新反思一下学术史研究的根本失误,重新反思一下“学术史反思”的“本体属性”,将不失为最有效的切入点之一。

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症候”,大面积的“学术史反思热”,大都兴起于传统的学术研究范式的合法性已经解体、新的学术研究范式尚未建立的临界时刻。在这样的“临界时刻”,任何真正的学术史研究,都必然会担负起如下一种双重使命,并体现出某种新旧学术范式相交织、交替的特质:一方面,它必须通过学术史现象的梳理来重构出某种已然形成而又尚未被清晰揭示出来(换一句话说,就是“日用而不知”)的学术“传统”。这是常规的学术史研究所必须

①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学术史研究热大体经过了如下一些阶段:起先是对现代中国学术史的整体性的或分科性的梳理,然后是对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贯通性的概括和总结,然后就是大面积的分科性的“新时期30年学术”和“共和国60年学术”的回顾与反思。

② 早在1997年的《“思潮”与“学术”》(文载赵汀阳、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一文中,叶秀山就已指出:“‘流行’的‘热’主要是一种社会的‘思潮’,而不局限于‘学术’。”“‘思潮’是‘学术’更广泛的基础,它可以推动‘学术’,但它本身还不是‘学术’。”按此意见推断,持续了近20年的学术史反思热,当始终停留在“思潮”的低水平重复的层次,而根本未成为真正的“学术”。

考虑的内容。这一任务使学术史研究必然会体现出传统的学术研究所具有的范式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在重构这一“传统”的同时,审视并质疑这一“传统”的合法性,为这一“传统”的必然断裂提供理论的论证,为未来的学术“传统”开掘出某种新的地基。这一使命使任何真正的学术史研究,都必然会体现出某种新的范式特征。

学术史研究如何以一种最佳的姿态或策略介入这一双重使命并体现出这种双重特征呢?表面上看,一种学术研究范式的合法性的解体,乃是因为这种学术研究范式失去了阐释的有效力。而实际上的根本原因,乃是这种学术研究范式有关“究竟何谓学术?究竟何谓学术史?究竟何谓学术传统?”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不言自明的假定或普遍预设的解体。换句话说,就是支撑这种学术研究范式的合法性的自明性地基的解体。由是,学术史研究的根本任务和最佳切入点之一,就是通过上述预设前提的局限性来为新的自明性预设敞开可能。

然而,学术史研究如何才能具体的学术史现象的梳理过程中,自觉地超越出来,准确地把握住传统的学术研究范式有关“究竟何谓学术、学术史和学术传统”的不言自明的预设前提呢?这些预设前提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获得合法性的?这些合法性又如何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而内在解体?

显然,要回答上述问题,仅仅满足于经验性的总结或个体感悟,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到这些自明性预设的背后,在哲学的层面,全面揭示这些普遍预设之所以获得合法性的内在依据,以及这种“内在依据”在历史语境变迁之后又必然解体的“内在依据”,才能为新的学术研究范式的合法性的建立找到真正的前提。

从哲学上讲,使一种“学术观”、“学术史观”和“学术传统观”获得合法性的内在依据究竟是什么呢?考虑到所谓的学术研究,最终目的不过就是为了重新揭示一表述事物与事物、人与自然、人与

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及其演变趋势；因此，从根本上讲，使一种“学术观”、“学术史观”和“学术传统观”获得合法性的内在依据，那无疑就是在其背后，起隐蔽支撑作用的某种“世界观”（世界视野）、“历史观”（总体历史叙事）和“学术思想史的生成机制”预设及表意范式预设。由是，当一种传统的学术研究范式的合法性遭遇危机时，其“背后”的真相，就必然是与之相对应的那种传统的世界观（世界视野）、历史观（总体历史叙事）和学术思想的生成机制及表意范式的合法性的解体。相应地，一种新的学术研究范式的建构，其“隐蔽”的任务，就必然是某种新的世界观（世界视野）、历史观（总体历史叙事）、新的学术思想的生成机制和表意范式的重设。

厘清了这一点，我们也就领会到了学术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的复杂纠缠。厘清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真正地领会到学术史研究作为一项前沿性研究的真义之所在：

由于人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历史的生成机制预设及表意范式的变迁，不过是“时代风气”的变迁、文化精神的变动和全球文明的转型在哲学或思想上的表现。因此，学术研究的范式转型就并非一个书斋里的事件。它往往与“时代风气”的变迁、文化精神的变动和全球文明的转型有着紧密的关联。而学术史研究，一方面既是对这一“变迁、变动和转型”的积极介入，另一方面又是对这一“变迁、变动和转型”的深入批判。

以此“本体眼光”反观当代中国学界广泛流行的经验感悟式的或对象化的、历史（事实）描述或归纳式的，以及主观期待的或结论在先的学术史研究，究竟有多少著述领会到了上述学术史研究的双重使命呢？又有多少人自觉地反省了自己不言自明的“究竟何谓学术、学术史和学术传统”的预设前提？如果绝大部分著述在进入具体的学术史研究之前，连这些最起码的前提性问题都未加以反省，如何指望它能够率先实现学术研究的范式转型？又如何能够指望它通过学术史的研究，发现既具有现代中国学术思想演进

的内在必然性的,又与全球学术思想的转型变迁趋势“同步共振”甚至“预流”的“问题谱系”和“方法路径”?如果这一切前提都不具备,又如何能够指望当代中国的学术史研究,能够通过对现代中国学术的“问题谱系”的反思和“方法路径”的推进,提炼出新的命题与理论假说,并有效地解释和应对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剧烈变迁与转型困境?

二、思想史研究的内在困难

学术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有着内在的关联。这意味着,学术史研究必须推进到思想史研究的层次,学术史研究才能完成自己的双重使命。

可问题是,在目前分科治学的格局下,思想史研究不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研究领域吗?在当代中国学界,不是有许多学者专门从事思想史包括现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吗?学术史研究为什么不向他们寻求现成的借鉴,而要另起炉灶,越界进入一个自己完全不熟悉的陌生领域呢?

如是,学术史研究,在还未进入具体的研究之前,就已经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抉择。为了明智地做出这个抉择,在此,学术史研究就必须完成一个前提性的工作。这一工作就是:预先对“究竟什么是思想史研究?”、“如何进行思想史研究?”——亦即,“思想史研究的本体属性究竟为何?”这样一些问题作出一般性的反思,然后根据这一反思,对当代中国学界的思想史研究状况做出恰当的分析。

思想史研究有着什么样的“本体属性”呢?通常来讲,不管是广义的思想言说,还是作为一种学科建制的思想史研究,大都遵循如下通则:鉴于“思”这回事物的急迫性和凭空地“思”之不可能性,因此,任何真正的思想者都必然会意识到,“思”即思想史。换

句话说,就是从“思想”的层面上讲,为了应对现实之急需,最好的途径,就是向全部思想的“历史”和丰富性开放,让“思”成为“历史必然性”之思。否则,思想便会成为毫无根据的玄学。

意识到此思想史研究的本己属性,我们也就能够意识到,思想史研究具有如下双重任务或双重使命:一方面,思想史研究必须如实地还原和重构思想的“历史”本身;另一方面,思想史研究又必须通过此重构而把握住历史中的“思”,即“思”的历史必然性,以回应现实之需。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史研究就必然会成为整个人文学术研究中最具有学理依据、最具有历史深度、最具有超越性、又最具有现实关怀的学科之一。

然而,意识到此思想史研究的双重任务或双重使命,并不必然意味着,人们就此找到了进入思想史的最佳入口并能够始终如一地恰当地“思”。思想史研究有着特殊的困难,每推进一步都可能遭遇陷阱,足以让任何一个审慎者望而生畏。

首先,“思想”不同于一般的客观“事实”。“思想”乃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历史主体的活生生的“观念意指”。对于这种活生生的自我运思着的观念意指,思想史研究者如何将之对象化,亦即将之事实化,而“客观”地把握其生成演变的过程?

其次,纵使可以将“思想”划分为一个具有自身封闭性的独立领域,“思想”也不是某种本质透明、逻辑自洽的观念同一体。作为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特定历史主体的活生生的观念意指,特定的“思想”总是与特定的时代背景、主体的言说能力和语言本身的表意极限空间联系在一起,乃至受制于这一时代背景、表意能力和表意可能。换言之,就是特定的思想言说,总是与特定历史的“无知之幕”、主体有限性和言说之不可能性联系在一起。思想史研究者,如何穿越这些语言的、历史的和思维本身的迷雾,而把握住历史中的“纯思”,即把握住“思”的永恒普遍性,进而把握住其“历史”?

第三,不仅思想者个体内部充满了矛盾冲突和混乱歧异,就是

同一时代、不同时代的思想史内部,也是如此。可令人惊奇的是,就是这些矛盾歧异、对立冲突的思想言说,尽管随时随地都处于剧烈变迁和合法性危机之中,居然并行不悖地形成了“统一”的思想史。思想史研究者,当具备什么样的品性和才具,才能不带任何预设地穿行于这些矛盾歧异、不断变迁的思想言说之中,以厘清其生成演变的轨迹?

单单是应对上述困难,就已经殊为不易了。更何况,思想史研究的本己使命,乃是通过对具有上述性质的全部思想史的研究,以把握住历史中的“思”,即“思”的历史必然性和永恒普遍性,进而提出全新的时代之思。思想史研究当如何努力,才能承担起这一本己使命呢?思想史研究者,如何超越自身的有限性,以自身矛盾歧异的主体之思去把握住历史中矛盾歧异的主体之思?思想史研究者,如何跨越历史语境的阻隔,去把握住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歧异的思想的内在关系?思想史研究者,又如何突破语言表意的极限空间,使“思”在新的时代获得新的表意形式或载体?

显然,要保证上述所有工作都不至于沦为“今之视昔”的专制,要保证在从事上述所有工作时尽可能不带某种未经反思的先验预设——换言之,就是要保证自己对“思想史”的反思是出自“思想的历史”本身,要保证自己对“思想”的反思获得最起码的“思想”的品质,一个必要的步骤,就是在进入具体的思想史研究之前,首先完成对“究竟什么是思?究竟什么是思想史?究竟什么是思的历史必然性?”这一系列问题的反思。

悖论的是,基于“思”的内在本性,当我们要着手对这些前提性问题反思时,又必然要以对全部思想的“历史”和丰富性的开放为前提。因此,对“究竟什么是思?究竟什么是历史?究竟什么是思的历史必然性?”的反思,就必然要转化为对整个思想史的思,亦即,在对整个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的思,而不是历史哲学的玄思。

问题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思想”异常复杂的时代,对全部思想的“历史”和丰富性的开放如何可能?在此,我们能指出的是,如果思想史研究的本己使命就是挑战这一难题,那么,唯一可能的路径,就是在对全部思想的历史和丰富性的反省过程中,竭尽全力地超越出来,看穿种种现成的思想言说的帷幕,发现全球思想所共同具有的“问题谱系”和“思想路径”,然后着手对这一“问题谱系”的新的裁决、对这一“思想路径”的新的推进。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显然,我们必将对“究竟什么是思?究竟什么是思想史?究竟什么是思的历史必然性?”这样一些前提性问题做出全新的思。

反观当代中国的思想史研究,^①我们能否看到某种现成的可能呢?

尽管从一开始就充分地自觉到了思想史研究的内在困难,当代中国的思想史研究,绝大多数,依然将“思想”当成了一个现成的历史的对象(观念实体),从而混淆了思想的“历史”与历史中的“思”的逻辑层次,完全没有把握住这二者之间的遥远距离或矛盾张力,更别说对“究竟什么是思?究竟什么是思想史?究竟什么是思的历史必然性?”这样一些前提性问题作出卓有成效的思。^②如

① 尽管90年代学术史反思热的兴起,意味着对80年代思想文化热的反动与反省。事实上,除了90年代前期短暂的沉寂之外,思想史研究一直是当代中国人文学界的显学之一。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在我看来,原因有二:一、当代中国学界急切地想要从思想史中寻找思想资源,以有效阐释当代中国。二、学术史反思热,内在地包含着对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史反思。

② 《思想史研究》辑刊的编者将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的主题命名为“思想史的元问题”,并在此同名专栏的“编者按”中说:“本专题以‘思想史的元问题’为名,意在讨论‘思想史’这个观念本身的内涵及其历史性生成,同时反思‘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方法、性质等可以纳入这个相对独立的问题阈中的东西。事实上,当前国内对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引介与评论,包括了英文中‘history of thought’(柯林武德用语),‘history of ideas’(洛夫乔伊用语,也译‘观念史’),以及‘intellectual history’(转下页)

是,尽管从表面上看,与学术史研究的范式转型的迟缓进程比起来,当代中国的思想史研究,跟当代中国的历史一样,已经经历了剧烈的范式变迁。^①然而,从当代中国思想界层出不穷的“主义式”言说和思想史研究的“范式不稳定”状况来看,当代中国的思想史研究,与当代中国的学术史反思比起来,或许并没有获得多少更好的进展。如此的思想史研究,除了将思想史从一种不言自明的预设中解脱出来,又纳入另一种不言自明的预设之外,^②如何能够发现既植根于思想史的历史深处,又具有全新的时代有效性的“问题谱系”和“思想路径”?又如何能够实现“历史与逻辑”或“历史与义理”的统一?

怪不得当代中国的思想史研究,始终无法为当代中国的学术史研究提供更多的思想启迪。

三、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复杂纠缠

一方面,学术史研究必须推进到思想史的层次;另一方面,思想史研究又亟须在学术史的层面实现自身的范式转型。如是,学

(接上页)(斯金纳、拉卡普拉及以后当代作家用语)这三个研究领域中的内容。当然,在思想史研究的地域版图上,它也是要涉及到法、德等其他非英语西方国家的。”此后又将该卷的修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改题为“什么是思想史”。上述迹象表明,当代中国学界似已对思想史研究的前提性问题的反省有了相当的自觉。然核查其中所刊发的文字,实则不过是对西方学界对相关问题的思考的引介而已。中国学界对此问题的独立思考,依然缺失。

① 可以将这一范式变迁的历程大致概括为:从传统的将哲学史等同于思想史的写作取向到将社会史与观念史相结合的努力,从个案式的研究到文本解析,从以问题史为中心到以关键词为聚焦点,从文化研究的转向到新一轮的经典重释。当然,这一转变过程具有多歧互渗的特征。

② 这些预设包括:进化论、科学主义、(社会发展史)革命史叙事、历史主义(人本主义)、现代化、现代性(现代性悖论)、全球化(全球格局),以及在“中西古今冲突”中的各种价值立场预设等。

术史研究就交织了多重的学术、思想使命(其实,思想史研究也是如此)。可是,学术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明明又有着完全不同的“本体属性”。这些“本体属性”的差异使得学术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有着完全不同的学术使命、方法论困难和问题意识。学术史研究如何才能把握住这二者的差异与内在联系,并自由地穿梭于其间呢?为使在具体的学术史研究的过程中不致迷失方向、误入歧途,在此,在还未具体地展开对“究竟何谓学术?”、“究竟何谓思想?”这些问题的反思之前,预先反思一下“思想”和“学术”究竟具有怎样的复杂关联,或许将不无助益。

事实上,早在学术史反思热兴起之初,“学术”和“思想”的关系,就成了学界讨论的话题之一。针对90年代的学术史反思热,李泽厚作了“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的评价。^①针对李泽厚的这种“把学术和思想截然分开”的思路,王元化则提出了“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的主张,以示二者内在相通。^②

王元化和李泽厚的争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肯定“学术”与“思想”有内在联系的一方认为:“事实上,经过充分讨论的思想就会产生学术问题,而真正的学术分析必定具有思想水平。”^③而看到了90年代的学界在“学术规范化”的取向下,“思想”与“学术”确有所分离这一事实的一方则客观地指出:“一方面,悬置简单僵硬的价值判断,为挖掘和重现大量被忽视的事实开辟道路,使学术研究获得新的视角和突破。另一方面,在过分标榜价值中立的情况下,有些不可逃避、无法消解价值判断和道义立场的问题,往往

① 该评论出自《二十一世纪》(香港)，“三边互动”栏李泽厚致该刊的书信，1994年6月号，总第23期第159页。

② 参《学术集林》卷一“编后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70页。

③ 赵汀阳、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前言”，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也被简化为单纯的事实或数据而被冷酷地处理。”^①

然而很显然,对于“学术”与“思想”的复杂关系而言,如果我们永远停留于这样的主观期待或经验直观,是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必须对“学术”与“思想”的关系作出深入的反思,学术史研究才能获得真正的实绩。

“学术”与“思想”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复杂关系呢?如果说,“学术”的根本目的是追求“真知”,那么,在所有“知”(包括真知和伪知)都必须落实于“表达”或“言说”的意义上,我们便可以将“真知”划分为三个层次:“材料”之真、“表述”之真和“含义”之真。不仅可以作这样的划分,我们还可以确定这三者的逻辑顺序:由“材料”之真决定“表述”之真、由“表述”之真决定“含义”之真。

然而,假定某种“材料”之真是确定无疑的,由此“材料”之真,如何通过“表述”就必然导致“表述”之真进而导致“含义”之真?通常的回答是,因为“材料”之真、“表述”之真和“含义”之真与某种外在的、客观化的“事实之真”、“命题之真”和“思想之真”一一对应,且二者具有同样的逻辑序列关系。

然而,由于某种“事实”的不可穷尽性、“言说”的终极不可能性和“思想”的主体有限性的客观存在,我们如何能够假定“材料”之真、“表述”之真和“含义”之真与某种外在的、客观化的“事实之真”、“命题之真”和“思想之真”的一一对应?又如何能够假定它们具有相同的逻辑序列关系?

由此看来,所谓“材料”之真、“表述”之真和“含义”之真的划分之所以可能,其逻辑顺序之所以具有合法性,其实不过是因为我们预先作了一种假定。由是,当我们在努力确定某种“材料”之真、“表述”之真和“含义”之真时,如果我们不同时质疑它与某种外在

^① 徐友渔:《学术范式的转换》,文载赵汀阳、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第19页。